

中國文化研究所金禧紀念

喚回四十一年夢

陳方正

初次對中國文化研究所有點印象，應該是1976年左右。那年劉君若到香港中文大學休假，在所裏掛單。她是姊姊的好朋友，從小相熟，後來到明尼蘇達大學教書，難得來香港，自然要藉此機會經常見面。這樣，也連帶認識了所裏的一些前輩學者，像來自俄亥俄的李田意、來自坎培拉的柳存仁、從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來中大擔任講座教授的周法高等，至於本校的李棫和王德昭則是聯合書院同事，早已經認識的。哥倫比亞大學的胡昌度那時已經卸任研究所所長，但也還不時回到中大。君若姐姐是女中豪傑，為了記錄佛曲和地方戲，經常背上照相機和錄像設備，跑新界的偏僻村落廟宇，不時也參加研究所的宴遊聚會，怡然自得。我輩份小，又不同行，卻因為有熟人，遂也混迹其間。不久我赴牛津進修，遊山玩水看書訪友，頗逍遙自在。歸來後大家茶聚，胡昌度問我此行有何心得，我一時感觸，信口答曰，歲月蹉跎，都覺得來到夕陽時分了。大家一聽，哈哈大笑不止，我也跟着起哄。但他們此笑是何心情，則要多年後方才體會。世紀之交我為研究所編輯圖史，初嘗「訪舊半為鬼」滋味，不過當時還能找到胡昌度寫憶舊文章，劉君若追述「採風」往事，和為她的西南聯大老師李田意作小傳。如今則風流雲散，故人已矣，真正是夕陽西下，只剩半天晚霞了。

說來，那時研究所成立已將近十載，裏面還有好些其他人物。嚴耕望治學精嚴，但幾乎從不來所，後來在二十五周年宴會上露臉，真有驚鴻一瞥之感。孫述宇是翻譯研究中心創始主任，也是家庭朋友和羽毛球夥伴，相熟甚早。他出身北大、新亞和耶魯，才氣縱橫，頗為自負，但不知何故，短短兩年後中心主任便改由校長特別助理宋淇擔任了。此後宋和老朋友高克毅共同創辦《譯叢》雜誌，旨在將中國文學翻譯成典雅英文，這適合西方大學課程需要，也能打響國際知名度，所以大為成功。我到大學秘書處之後開始和宋相熟——其實，在中學時因為經常看《人人文學》，早已經聽過林以亮（宋淇）和夏侯無忌（孫述宇的兄長孫述憲）的大名了。高克毅以談諧和英文精闢知名。有一趟我請他參加聯合書院午餐會，他看着杯中白葡萄酒有感，調侃說“such high life!”我隨口答曰“but we are not high”。他有點意外但很高興，回應道：哎呀，這種口吻可是我的專利喲！

研究所的房子由利希慎家族捐資興建，推動其事的是利榮森。他早年就讀金文泰中學，頗受辛亥革命後來港的前清遺老影響，其後北上進燕京大學，醉心文物考古和傳統文化，因此所內最龐大的單位就是文物館。開館展覽在1971年舉行，當時聯合書院還未曾遷入沙田校園，所以我對此盛典毫無印象。館長屈志仁是利公親自物色的，他年少英發，很有作為。但十年後我到秘書處不久他就辭職赴美，另謀發展去了。我為他餞別，不料他卻大發牢騷，所為何事，始終不得其解。最近他重訪文物館，雖是載譽歸來，卻垂垂老矣，無復當年風采。他之後館長由藝術系主任高美慶兼任。高是中大畢業生，斯坦福大學藝術史博士，父親高嶺梅則是張大千摯友和收藏家。她為人認真，工作勤奮，進取有為，學系和文物館兩方面都管治得井井有條，可惜後來離開中大，到公開大學當人文社會科學院院長去了。接替她的林業強是一位碑帖和器物專家，為人篤實，沉默寡言，雖罹惡疾卻幸運康復，得安享退休生活。

我得到馬臨校長支持，在1986年離開秘書處到研究所，至今整整三十一年。那時物換星移，接替李田意的陳荊和與鄭德坤兩位所長已經先後退休。陳是越南史專家，為人嚴肅拘謹，和東瀛有頗深淵源，習慣容貌也酷似日本人，離開中大後即受聘於創價大學。鄭公個性剛直，事業心重，二戰時在華西協合大學開創四川考古學研究，戰後任教劍橋大學，以迄受聘到中大出掌藝術系，退休後仍然孜孜不倦，在所裏創辦考古藝術研究中心，後來不幸由腹瀉引起中風，這才再度引退。

當時所裏還有四位前輩，我戲稱「商山四皓」，那就是饒宗頤、劉殿爵、鄭子瑜和勞思光。他們各有千秋，從來湊不到一處，我相約飲茶聚談，也無法打開局面，只好作罷。勞公早年研究康德，後來以三卷《新編中國哲學史》成大名。他個子矮瘦，談笑風生，一輩子打蝴蝶領結，那時剛從哲學系退下來，因為不看好香港前途，沒有多久就到台灣去了。子瑜先生孤身一人從新加坡來港，據說是為了政治原因。他研究修辭學和黃遵憲，著作豐富，為人隨和，言談行事卻透着點糊塗和詼諧，留在所裏直到八五高齡方才退下。

劉公先君是香港著名詞人，自己則出身港大和格拉斯哥大學，以《論語》、《孟子》、《老子》三部經典的精闢英譯馳譽國際，是馬校長特地從倫敦大學敦聘到中大出掌中文系的。他為人清靜淡泊，不喜遠遊，醉心古典音樂和黑白方圓世界，對學問擇善固執，絕少游移。1989年風暴後，本來任教北大的陳鼓應有點徬徨失據，我遂邀到所裏訪問。他推崇道家，有一趟演講，討論它的起源問題，我請劉公和饒公一同出席，不料他們意見相左，場面尷尬，此會遂成絕響。我到任未久，翻譯研究中心主任閔福德(John Minford)辭職，劉公推薦他的得意弟子孔慧怡接任。孔也出身港大，後來留學倫敦師從劉公。她中英文俱佳，嚮往《譯叢》已久，上任後如魚得水，中心遂蒸蒸日上，劉公可謂知人矣。不過才女難免偏執和情緒化，要保持和諧也頗費周章。

到了80年代末，劉公找我合作申請研究資助，將古籍輸入電腦以編輯索引。此計劃進行順利，實際負責的則是他招聘的另一位愛徒何志華。何是中大畢業生，沉實苦幹，頗有城府，後來繼承劉公衣鉢，建立中國古籍研究中心，升中文系主任，更當上副所長。至於劉公本人負責的，其實是中國語文

研究中心，它的前身是周法高的中國語言學研究中心，主要是為編輯《金文詰林》等大部頭著作。我到所之後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說服劉公一起創辦《中國語文通訊》雙月刊，希望在社會上建立一個供各方討論中文問題的園地，可惜後來它演變成專門學刊，失去原意了。劉公的興趣集中於古籍的電腦化之後，中心的工作其實是由張雙慶負責。他是本校畢業生，為人熱心，凡事從不計較，致力方言語音研究多年，後來繼劉公成為中心主任。

四老中饒公才大如海，名滿天下。他追求「學藝雙楫」，深究甲骨，以史學「兩司馬」自期，更游心文學，雅擅丹青撫琴。我曾戲問「琴棋書畫詩酒花」已得其四，何不更對枰舉杯賞菊呢？他笑曰：還是留下些缺憾好。我又請教保持矍鑠的秘訣，他說得力於年青時族叔傳授氣功，此後修練不輟。道教專家柳公存仁也好此道，卻輕描淡寫，說只可減少傷風咳嗽而已。如今饒公壽登期頤，看來是和天生異稟有關吧。他有慧眼，聘沈建華為助手，遂事事有商量倚靠，學術上更得心應手。建華家學淵源，忠誠樸素，踏實苦幹無人能及，但也有固執一面。我給過她一些忠告和幫助，她念念不忘，數本著作一再央我寫序，也算是有緣了。後來饒公移師港大，她為李學勤招往清華，開闢另一番天地。

鄭公的傳人是鄧聰，他是中大畢業生，留學日本多年，1985年左右回研究所任職。此君年青，野心幹勁十足，而且很踏實，埋頭從香港本地田野發掘做起，然後逐步向澳門、中國大陸乃至周邊地區發展，幾十年下來成績斐然，令人側目。可惜他個性過強，有遠交近攻傾向，本地同行如區家發等後來都拉倒，此外卻朋友遍天下。其初考古藝術研究中心還有老資格的楊建芳，他和文物館的王人聰都來自大陸，但彼此並不相合。楊退休後鄧聰終於升主任，中心這才慢慢平靜下來。後來利公推動興建研究所新翼，原意是作為考古研究所，不料新翼未成老人家已經辭世，利氏基金會負責人有變，於是又生風波，鬧得不可開交，此是後話不提。

由於利公的影響，亦由於中大過往學風使然，研究所歷來以研究傳統文化和文物為主。直至80年代中期，只有王德昭研究近代變革史與孫中山，以及胡昌度提出要以研究現代化歷程為發展主要方向，這兩者是例外。但德昭先生早逝，胡公只是訪問期間略示意見，都未影響大局。我到所之後有意更張，卻苦無機會，能做的只是支持王爾敏整理和出版盛宣懷檔案而已。轉機出現於1989年春夏間，當時金觀濤和劉青峰來所訪問約半年，卻因時局生變而長期滯留。有了這兩位生力軍幫忙，又得金耀基兄支持，我才有機會創辦《二十一世紀》雙月刊和當代中國文化研究中心，由是推動近現代中國研究，和國內外學者交往，造成蓬勃興旺局面。金劉兩位出身北大，文化大革命後自學成才。80年代民間文化運動風起雲湧，兩人因緣際會，脫穎而出，成為思想界引領風騷人物。

在所裏安頓下來之後，金潛心思考寫作，劉編輯雜誌和叢書，兼管大小事務和對外聯絡。他們精力旺盛，奮發有為，和我也頗為相得，合作無間，所以在90年代同心協力，做了不少事情。那時《二十一世紀》不分背景、專業、派別，網羅了國內外許多重要作者，因而名聲鵲起；中心得到洗為堅捐資設

立講座，請來高行健、劉小楓、張承志、余華等各顯才華，令人耳目一新。至於在出版方面，則高華的《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和觀濤主編的十卷本《中華人民共和國史》也都在學界產生了相當衝擊力。想不到的是，我們先後請來劉小楓、汪暉、劉擎等出任研究員，希望深耕厚植，卻不成功。他們都是一流人才，但理念不同，打算各異，逗留兩三年後都選擇返回國內發展，而且不旋踵就獨樹一幟，各自領軍了。這使我體會到，研究所水淺池小，難容蛟龍，能留下來的，倒是年長踏實，本來就有意移民香港的鄭會欣。他出身南京大學，在第二檔案館工作多年，和國內近代史學者稔熟，經多年努力，在民國經濟史領域做出很扎實的工作來。最惹懷念的，還有當時一個小型研討月會，由大家輪流就手頭工作或者感興趣題材作報告。除了金劉和我三人以外，哲學系石元康和他的學生周保松幾乎每會必到，不少所外研究生也常來，會上大家無拘無束，熱烈爭辯，此情此景，至今猶在目前。

研究所內還有許多其他同事給我留下難忘印象，像負責參考圖書室的孔黃秋月和中國語文研究中心的蔡俊明工作循謹認真，文物館的黎淑儀是紫砂壺專家，吉祥塊頭碩大，負責電腦系統的何潔鈴得空便到日本旅行，朱國藩瘦削寡言，等等。朱協助編輯《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多年——這是本所第一份刊物，創刊主編是經濟史家全漢昇，後來由劉殿爵和陳學霖依次接替。學霖兄精研金元明史，治學篤實，為人熱誠，不料從中大歷史系退休未久就遽然辭世，令同事學生傷痛不已。和我接觸較多的，則是《二十一世紀》和所本部的同事，包括吳江波、余國良、林立偉、黎耀強等幾位編輯，他們都是一時俊彥，後來各有精彩人生；負責行政的關小春像是弱不禁風，卻酷愛足球，獨立特行不輸男子漢；此外負責排版印刷的張素芬自創刊開始就謹守工作崗位至今，其認真負責、一絲不苟的精神令人肅然起敬。對我幫助最大的，則是所務室幾位同事：邱玉明代為處理借書繁瑣事宜，從無怨言；李潔兒是貓癡，她不厭其煩，耐心教導我有關電腦和手機的奧妙，對圖片、文字的製作和設計更務求盡善盡美。所務秘書嚴桂香是大學秘書處的舊同事，她通情達理，善解人意，卻又黑白分明，謹守原則，最難能可貴是助人為樂，善於斡旋協調上下八方。能夠和她合作是我的運氣，也是緣分。數年前她提早退休，放下擔子之前還福至心靈，想到引薦文物館的陸美彰自代，使得交接順利，後繼有人，這是許多高級主管都自嘆弗如的。

天下無不散之筵席，我在本世紀初退休，過了五六年，金劉二位應國立政治大學之聘，飄然赴台，《二十一世紀》改由北大的顧昕遙領主編，當代中國文化研究中心人去樓空，頓時沉寂下來，前後不到二十年。所幸大學很念舊情，讓我留在所內埋首自己的工作，一晃不覺又十五年，堪堪要和在任的十六年扯平了。此刻尋思往事，獨立殘陽，難免有驚夢之感，拉雜寫來，就算是朝花夕拾吧。

陳方正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名譽高級研究員，前所長。